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 的必要性及路徑探究¹

盧頌馨² 徐俊³

摘要: 新形勢下做好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開發開放,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為澳門長期發展注入重要動力的重要舉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應當緊緊抓住開發戰略所帶來的發展機遇,積極推進涉外法律服務的發展。本文將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成立的背景以及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關係出發,分析深合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的必要性,並且立足於橫琴當前的發展水準,闡明了涉外法律服務建設中遇到的挑戰。最後從四個方面提出提高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水準的可行性路徑。

關鍵字: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涉外法律服務 一帶一路 數字法治 人才培養

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成立的背景

(一) 成立背景

1. 國家政策的支持

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我國政府就特別重視中國內地如何更好地與香港澳門之間發展聯係起來的問題,而內地與港澳之間發展關鍵點之一在於交通基礎設施,但是隨著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它作為廣東、香港、澳門合作建設的重大跨境、跨海戰略性通道,使得珠海成為連接香港、澳門之間陸路的重要城市。於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在這之前先是提出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橫琴方案),發展規劃中預計把橫琴島

1 本文為深圳職業技術學院2022年博士啟動項目“粵港澳大灣區協同視野下澳門法治創新模式研究”(編號:6022312011S)的階段性成果。

2 澳門大學法學博士,現任現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法律事務專業專任教師,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財稅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深圳大學監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遼寧科技大學法學碩士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制度。

3 遼寧科技大學法律(法學)碩士在讀。

劃入珠海特區建設範圍內，並且在“一國兩制”背景下進一步將橫琴構建成下探索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與社會發展創新模式的先行示範區。⁴但為何要選擇澳門與廣東合作開發橫琴？筆者分析主要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體制，我國實行一國兩制制度，澳門屬於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澳門保持自由港、單獨的關稅地區地位，資金進出自由和金融市場經營自由給投資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第二，地理環境，橫琴是珠海市數百個島嶼中地理位置較優越的一個，位於珠海市南部，與澳門一橋之隔，處於“一國兩制的交匯點”，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其作為澳門建設的擴充具有先天的優勢。第三，法係傳統，澳門的法律來自於葡萄牙，而葡萄牙是典型的大陸法係國家，而中國內地清末民國時期引進西方的法律，基本是以大陸法係國家的法律為參考藍本，因此在法係傳統上有相近之處。

2. 轉型發展的需要

此次國家發展規劃，一方面給予澳門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澳門自身亦亟需社會轉型。自回歸以來，澳門的博彩業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但其單一發展模式下也暴露出許多問題，並且隨著這些年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片面追求物質生活提高到同時需要滿足精神生活提高的轉變，使得消費習慣發生了變化。⁵2020年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澳門旅遊業和博彩業發展收入明顯下滑（如圖1），因此這種單一的產業結構又不得不引發政府及社會公眾思考。如何實現澳門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成為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目標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澳門也正好需要一次轉型的機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就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誕生了。



圖 1 2011 年 -2020 年中國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及增速變化

資料來源：數據來源於澳門統計局

4 黃雲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深度解讀》，《廣東教育高中版》2021 年第 11 期，第 54-58 頁。

5 梁涵；沈夢怡；吳志遠：《珠海推動橫琴開發建設，加快跨越轉型發展》，《南方日報》2021 年 10 月 12 日，第 A09 版。

（二）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關係

首先，《橫琴方案》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形勢下，企業投資開發建設橫琴，目的是為了激活當地經濟創造活力，打開深合區的開放門路，推動深合區與粵港澳區域協同發展。⁶ 此次《橫琴方案》的正式公布，也是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如何推進深港澳合作開發橫琴的重要指示精神，有利於中國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先行先試，全面發掘粵港澳大灣區體制的創新潛能，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港澳規則銜接、制度互動，豐富國際合作與協同發展模式。⁷ 《橫琴方案》方案的實施，一方面對於積極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新試點平臺、積極構築國家高層次人才開放門戶樞紐、進一步形成全球合作與競爭新的優勢具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同樣也將為推進深化港澳臺經濟合作、保障香港、澳門社會的長治久安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其次，粵港澳大灣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具有“一二三四”的特征，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但在這三個關稅區當中存在三種不同的法律制度，因此在這種差異下就要求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制度和諧發展上多注重他方的利益訴求。⁸ 因此，從這一方面來講，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的建設同樣也對粵港澳大灣區解決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和加強法律制度的銜接具有促進作用。

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的必要性

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建設，不僅是適應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形成對外開放發展新高度的應有之義，還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並且對於增強我國在處理涉外法律服務糾紛中話語權以及影響力、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涉外法律服務糾紛中的正當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⁹ 因此，就必須把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的高度，采取有效辦法，建成完整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體係主要表現在：

6 陳姪楠：《為粵港澳大灣區注入新動力》，《人民日報》2021年9月10日，第006版。

7 張謙：《國際戰略大背景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

8 文雅靖：《如何協調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制度體係》，《開放導報》2019年4月8日第2期，第56-60頁。

9 楊立民：《中國涉外法律服務准入機制的爭議、現狀與比較》，《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8年5月15日第25卷第3期，第15-24頁。

（一）構建涉外法律服務“防火牆”的需要

當前新冠肺炎影響依然嚴重，國際營商環境形勢依然嚴峻，對外投資貿易與商事糾紛日益增多，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建設涉外法律服務防火牆顯得尤為重要。由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東南亞、西歐地區在商事交易貿易往來上較為頻繁，但彼此之間的國際貿易規則、企業交易秩序、社會背景文化以及對外政策等方面有著不同的規定，這就必然會導致雙方主體之間的許多法律規範、經濟政策存在著差異，因而可能產生一些涉外法律服務上的沖突。特別是外國投資者在不了解我國的方針政策的情況下，有可能對於我國的涉外法律服務秩序造成沖擊，嚴重破壞市場交易，損害我國法律的信譽度。因此，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要充分利用對外開放重點改革區這個平臺，構建好涉外法律服務的防火牆，通過運用現代各種媒體技術，開通國外網站，通過舉行有關國際會議、高峰論壇等各種場合開展對外涉外法律服務宣傳。在涉及處理商事糾紛的情況下能夠更加可靠的適用我國法律解決糾紛，保護我國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而非在我國目前法律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盲目信從國外法律解決糾紛的便捷性、高效性從而侵犯我國法律領域的主權。因此，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的建設，也必將構築起橫琴涉外法律服務的防火牆。

（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助推企業發展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需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求灣區內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而橫琴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城市，對於吸引外來企業家前來投資辦廠，當地知名企業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¹⁰

而作為企業來講，“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開展涉外法律服務建設是適應我國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的需要。鼓勵和支持國內法律服務機構和法律服務人員參與中國企業涉外項目並進行開展工作，以及為中國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幫助，盡力做到中國企業“走出去”有強大的智囊團，中國公民“走出去”有強大的制度保障。¹¹《橫琴方案》自發布以來，橫琴新區注冊澳資企業超 4000 家，到稅務部門辦理企業注冊登記、增值稅發票申領等企業法人、非法人組織日益增多。¹²其中企業重點涉及國家高新製造業、

10 劉斌斌：《“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服務的必要性及其路徑分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20 年第 1 期，第 24-32 頁。

11 張偉倫：《契合企業所需，加強涉外法律服務建設》，《中國貿易報》2021 年 9 月 7 日，第 006 版。

12 葛愛峰，周倩：《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來了》，2021 年 9 月 8 日，www.chinatimes.net.cn，2021 年 12 月 16 日訪問。

中醫藥行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金融產業占比較大。因此，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對於本地企業“走出去”，吸引外資、企業“走進來”具有重要意義。

（三）打擊非法入境和實施跨國犯罪的需要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橫琴島，毗鄰港澳，靠近南海，地理位置獨特，非法入境以及跨國犯罪嚴重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安全，因此建立健全法律風險管理機制顯得迫切需要。越是開放程度越高越要注重國家、社會安全，強化底線思維，增強風險防範意識，及時研究處置粵澳深度合作區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各種風險。自 2000 年以來，為維護粵港澳穩定發展、淨化社會治安環境，廣東、香港、澳門三地警方每年例行開展一次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港澳黑社會組織等為主要內容的聯合打擊行動，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¹³

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一方面，在刑事問題上對於嚴厲打擊走私等違法犯罪活動、加強在聯合打擊跨國領域犯罪其中重點包括毒品、金融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依據國際條約和雙邊條約提供涉外法律服務、加深國際刑事司法協助領域措施、切實保護各國家人民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貿易糾紛問題上認真做好案件代理以及調解工作，保障商事主體的正常貿易往來，並且可以在相關案例糾紛中提煉出具有爭議的法律條文並在之後進行完善。

三、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發展現狀和困境

（一）發展現狀

在涉外機構設置上，去年年底橫琴珠港澳涉外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在橫琴掛牌運行，該中心也是橫琴新區根據自身優勢，站在如何建設涉外法律服務大局上打造出來的一站式“涉外法律服務中心”。¹⁴ 根據文件方案指出，橫琴珠港澳涉外公共法律服務中心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法律服務中心全新服務平臺，該中心聚焦港澳企業、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實際需求，全面整合設置涉外法律服務事項。目前已經進駐珠海國際仲裁院、橫琴新區國際仲裁民商事調解中心、橫琴公證、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海上絲綢之路法律服務基地，將繼續引進澳門法務局、澳門律師公會、中國法律服務（澳門）公司等，全面打造涉外、

13 林思含：《跨境經濟犯罪治理研究 - 以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經濟犯罪治理為視角》，《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21 年 7 月 26 日，第 1-13 頁。

14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官網：《珠海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務揭牌，為大灣區企業居民提供法律服務平臺》，2021 年 12 月 3 日，<http://www.hengqin.gov.cn>，2021 年 12 月 16 日訪問。

涉港澳人士的全方位、一站式法律服務平臺。在發展目標上，第一，該中心將為橫琴的港澳企業、外資企業、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等全面提供差異化、一門式、精準式的優質公共法律服務。第二，該中心將成為粵港澳及大灣區法律服務交流的重要樞紐及平臺，有效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法治環境融合、法治氛圍營造、法律服務銜接。打造為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體係建設的創新項目，搭建跨境法律服務平臺，探索立足珠澳合作、輻射粵港澳大灣區的具有代表性的涉外法律服務中心橫琴樣本。第三，以橫琴珠港澳涉外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的建立為契機，橫琴新區將持續探索、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全面發揮橫琴珠港澳涉外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的資源集中和集約化發展模式的優勢。第四，立足橫琴，銜接港澳，做好涉外法律服務。推動建立普惠性、公益性、可選擇性的法律服務平臺，致力於打造國際一流、重點示範引領的營商環境。

在涉外律師事務所規模及涉外律師人數上，《橫琴新區建設總體方案》不斷吸引著全國各地優秀律師事務所以及律師前來尋找發展機會，在近幾年的時間中，已經有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律所前往合作。在內部結構職能劃分上，許多律師事務所成立了商事糾紛法律事務部、金融糾紛法律事務部、房地產糾紛法律事務部等。匯集了來自各個專業領域的精英律師，組建了由資深律師與專業助理相互協作的穩定團隊，團隊內部分工清晰明確，具有極強的團隊協作力及創新力，積極運用法律的力量與智慧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¹⁵ 除此之外，今年7月份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考試在深圳市、珠海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三個地方舉行，舉行這次考試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及澳門法律執業者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具體步驟，這對於港澳律師發揮自身特點加入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努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法律服務水平提升一個層次具有裏程碑意義。

（二）發展困境

1. 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法律適用

自從我國實行“一國兩制”後，打破了數千年以來只存在一個法律體系的局面。在中國內地，只存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法律體係，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立法權和司法權。¹⁶ 第五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

15 袁達松；劉華春；張志國：《“一帶一路”中的中國律師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司法》2017年第1期，第38-45頁。

16 胡成利：《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立場》，《天津日報》2021年10月8日，第009版。

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仍應注意，憲法永遠是根本大法，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係中居於主導地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及中國內地的廣東省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我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2條規定：“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確定。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沒有規定的，適用與該涉外民事關係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構建更好的法律服務機制成為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的困擾問題。

2. 法係不同帶來的法律沖突

實行“一國兩制”後，我國的法律體係就其法律傳統或所屬的法係來看，將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即出現屬於幾種不同法係的法律。我國內地法律受大陸法係的影響較大，帶有大陸法係模式的某些特點，但主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是社會主義法係。澳門早期受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受到成文法影響，性質上屬於傳統的大陸法係。換言之，目前深合區不僅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制度，而且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法係，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係和傳統的大陸法係。¹⁷ 不同法係的影響結合在一起會造成不同的法律沖突，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係與傳統的大陸法係法律關係的碰撞，例如在深合區內發生的中國內地與澳門主體之間法律糾紛時是否能夠用一種創新的法律制度來解決問題，因此這也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建設的困境之一。

3. 缺乏專業的涉外法律服務人才

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對應的“如何培養和招引涉外法治人才”成為時代的需要。¹⁸ 我國目前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總量偏小、質量不高、經驗不足，主要呈現隊伍“小”、人才“少”、分布“散”、市場“亂”的特點問題（如圖2）。從下圖可以看出各省涉外法律服務律師人數總量小，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城市，中小城市的涉外律師遠不及發達城市，這也反映出經濟發展水平與涉外法律服務人數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同時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存在著對我國參與國際治理體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人才隊伍建設缺乏國家層面的統籌體制、人才隊伍的培養、管理、使用等各個環節存在體制機制障礙。這主要在於我國法學教育培養方式中缺少創新精神，未合理安排課程培養模式，沒做到專業能力與

17 蔣必果：《淺析“一國兩制”三法係四法域法律框架的構成》，《法制博覽》2015. 年第10期，第240-241頁。

18 穀昭民：《論法律外交》，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

素質能力的同步培養。¹⁹ 另一方面，就是沒有刻苦用心鑽研港澳地區的法律制度，只能說得上是了解，不能說是熟知，真正能做到有效銜接中國內地法律制度與港澳地區法律制度相匹配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少之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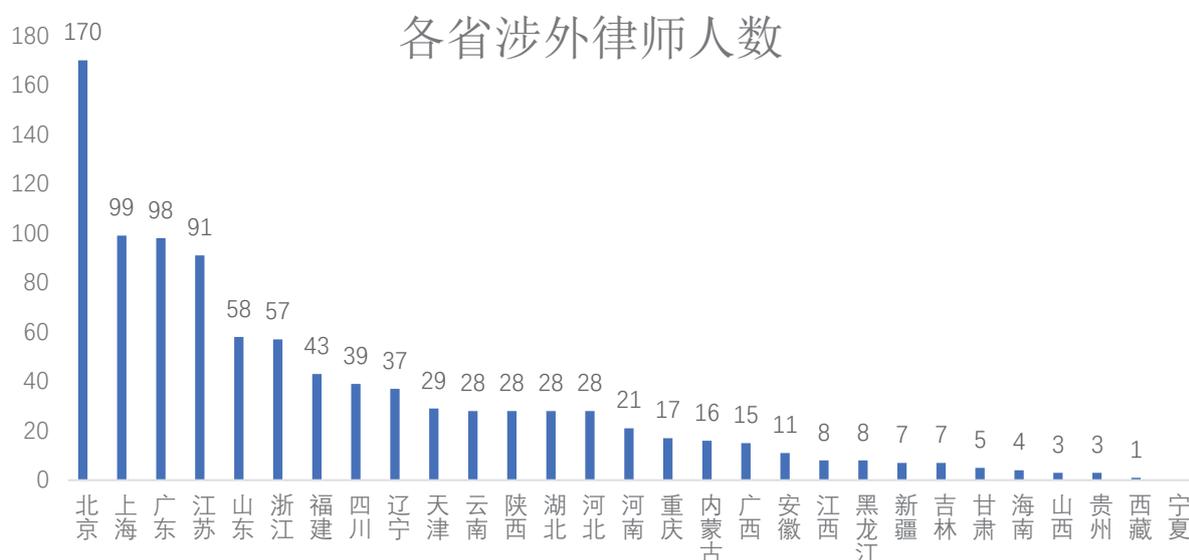


圖 2 各省涉外律師人才分布圖

資料來源：數據來源於司法部建立的“全國律協涉外律師領軍人才庫”

4. 對涉外相關法律研究不深，缺乏涉外法律服務實務經驗

中國法律服務工作人才隊伍中大多數人往往都會忽視國際法的重要性，不願意去開拓新的市場，因此在接手有關涉外法律糾紛時會顯得無從下手。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深合區企業必然與一些周邊國家企業發生經濟上的糾紛，因此當面臨不同的主體時，糾紛解決途徑的選擇也至關重要。以目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涉外法律知識儲備來看，還不足以應對當前市場的涉外法律服務需要。澳門近些年來金融業更新發展速度加快，目前能夠獨立承辦涉外法律糾紛例如反壟斷、反傾銷之類的案件的大陸人才少之又少，通常需要聯合其他國家律師專門協作或者協助辦案。²⁰ 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每年的金融糾紛案件多而且複雜，如果不能熟知香港的金融類法律規定並以此來解決問題的話就會極大地阻礙涉外法律服務建設開展工作。

19 黃惠康：《從戰略高度推進高素質涉外法律人才隊伍建設》，《國際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18頁。

20 袁宗勇：《關於發展壯大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探索與思考》，《中國司法》2017年第8期，第53-56頁。

四、提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水平的路徑探究

(一) 充分利用政策紅利，發展“數字法治，智慧司法”

1. 更新思維觀念，樹立人工智能、數字法治思維模式。黨中央著重強調要積極運用現代化高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手段來實現對制度運行的管控。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廣東省成立了全國首個境外法律查明平臺——藍海現代法律服務發展中心，杭州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先天優勢，努力打造全球數字治理第一城，提升城市的綜合治理水平。²¹ 真正實現思維模式的轉變在於懂得如何應用大數據、智慧雲、智能引擎、AI 等高科技轉變到具體的工作當中去，“數字法治，智慧司法”不僅能降低司法行政工作運行成本，而且還能緩解社會治理壓力，有利於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城市。

2. 整合數據資源，構建涉外法律服務數據庫。“數字法治，智慧司法”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對應的數據庫，目前深圳數字經濟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高水平規劃建設鵬城實驗室、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廣東省實驗室（深圳）、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等重大創新載體相繼落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緊靠深圳，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可以借鑒其發展經驗，搭建自己的數字法治載體。搭建以數據中心、指揮中心、安全中心為一體的涉外法律服務技術平臺，數據中心負責數據的分類保存歸檔以及共享，指揮中心負責資源的調配以及案件的分流，安全中心負責數據信息的安全，實現網上諮詢、網上申請、網上辦理一體化的公共法律線上服務。並且《橫琴方案》明確要為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創造條件，“數字法治，智慧司法”數據庫的建成，也必將服務於當地創新型企業，幫助企業規避法律風險，助推企業經濟騰飛。

3. 加強監督管理，落實風險預警及防範機制。大數據信息的開放性特征必然與數據安全存在著不可規避的問題，這其中就涉及到公民的個人信息、企業的經營發展信息、以及政府機關要密文件。²² 因此在“數字法治，智慧司法”平臺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應當重點防範數據信息的泄露而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基於此可以引入“監管沙箱”機制²³，雖然“監管沙箱”大多用於金融產業，但是從目前來看，已經有很多行業運用此項監管技術。法律領域引入沙箱不僅能夠創新出許多法律服務產品，並且能夠讓使用者的利益實現最大

21 肖全初；夏淑華；《數字法治智慧司法背景下推進司法大數據建設》，《法制博覽》2020年第32期，第30-32頁。

22 柳玉祥：《以“數字法治，智慧司法”助推法治事業高質量發展》，《中國司法》2020年第1期，第49-54頁。

23 秦勇；韓世鵬：《區塊鏈金融監管的新維度研究－基於沙箱監管的本土化創新》，《價格理論與實踐》2021年第8期，第132-135頁。

化，能夠避免平臺在最基礎的信息情況下給出錯誤的建議，避免其他公司說服客戶泄露他人信息，以及對信息數據的無止境追蹤，實現對數字法治係統的安全化監管，做到能夠提前預知風險，解決風險。

(二) 加強人才培養，建設高素質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

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才興，則法興，高素質的法律人才在推進法治文明、解決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而目前深合區在人才引進戰略、現代法律服務基礎硬件軟件、科技力量支持上都具有先天的優勢，因此在人才培養上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 法學院校是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培養的第一陣營

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指出：“要推進法學院校改革發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²⁴ 要加大涉外法學教育力度，重點做好涉外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人才培養、國際組織法律人才培養推送工作，更好服務對外工作大局。”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既面臨著機遇又面臨著挑戰，機遇表現在當前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需求量大，表現在我國涉外法治領域的主要挑戰有：在制度上，對於國外的法律制度及規則運行把握不透，不能及時地做出法律程序的選擇。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企業受到國外市場的排擠從而影響企業的生存。在領土權益上，企圖用法制和糾紛處理制度對中國主權、安全和經濟發展權益構成威脅和影響等。在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爭奪中，涉外法律業務人才已日益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資源，法學高等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整體性地位和作用越來越明顯。在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轉折點，法學院校作為培養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的第一陣營，其作用力不可小覷，因此，在培養方式上，我們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的創新，法學教育上可以從以下兩點出發：

(1) 雙學位聯合培養。²⁵ 澳門大學法學院擬開辦中國法與環球法學(英文)本科課程，目前也設有環球法律學係，深合區的其他學校也可以參考借鑒。雖然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本科階段都有設置雙學位課程，但大多數學校的雙學位都是與金融學掛鉤，真正選擇法律與英語課程的結合的同學是少部分。主要原因在於國人對英語的重視度不高，對之後的就業作用不大，所以造成了現在的局面。其次，大部分學校的法學和英語專業課程上未能達

24 李天池：《習近平人才觀研究》，沈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25 王新博；董昊衢：《新時代涉外法律人才培養路徑探究》，《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1年第43卷第1期，第37-49頁。

到有機統一，這兩類課程分別屬於不同的學院，在課程體係結構設計上，英語專業的目標定位與法學專業的目標定位未能融合，雖然開設了“法律英語”這門課程，但實際效果並不好，課堂上的學習僅成為老師單方面的授課，學生聽不懂，老師也很無力。因此，在開設的法律英語中，我們要著重接觸社會現實，而不能泛泛而談，看看實踐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設定“涉外法律專業服務”目標，致力於培養實踐性人才。一方面既能滿足學生就業時就業方向的可選擇性，另一方面又能符合國家人才戰略發展的需要，可謂一舉兩得。

(2) 國外參訓與引入課程或導師相結合。涉外法律服務必須是緊緊圍繞“現實需求”而設置的，在國際法律服務中，熟練地運用外語作為工作語言是基本要求，不僅可以降低工作成本，而且能提高工作質量與效率。因此，在人才的培養上，我國高校教育可以培養一批人才送到國外進行學習，由政府或者高校出資，選拔一批綜合素質較高的人才進行交流學習，在學成之後在專門進行培養。其次，引入導師制也是一個很好的培養路徑，在法律課程的設計中，加入涉外法律的學習，由專門的國外導師進行授課，並經常性的舉行寫作能力比賽，實踐操作，更加貼合實際的讓學生體會涉外法律服務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國際涉外法律服務人員的培訓質量取決於法律師資的國際化，有高水平的法律師資才能培訓出世界一流的涉外法律服務人員，這就需要法律師資必須具備在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涉外法律服務人員法學理論基礎與創新成果，並能緊隨時代變化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2. 律師事務所是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培養的第二陣營

根據最近公布的涉外律師名冊來看，根據工作的領域不同，涉外律師業務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商事貿易上，而律師事務所的人才培養模式是最適合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這是由於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性質決定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涉外法律服務人才不在於多，而在於精。²⁶ 律師事務所應當拿出足夠的耐心建立和培養自己的人才梯隊，目前大多數律師事務所的內部職能劃分為，業務部、刑事案件部、民商事案件部、行政訴訟部、服務的範圍是平常生活中的案件。但是，如果要想走在前面，就得拿出自己的特色，而近些年來國家的政策以及市場的需求也正為律師事務所的發展帶來了啟發和思考。律師事務所作為法律服務機構形式之一，在跨境貿易糾紛以及國際爭端解決領域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曆史上，國家外事機構在解決涉外法律服務糾紛上起主導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律師行業發展以及市場環境的需要，律師事務所在涉外法律服務建設過程中應當占據主要作用。其次，依托深圳證券交易所，深圳許多大型律所業務都會涉及幫助企業上市過程中把握風險防範，

26 龍湘源：《教學改革與涉外法律人才培養之探討》，《湘南學院學報》2017年第38卷第6期，第102-105頁。

並且在此基礎上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團隊，涉外法律服務經驗較豐富，可以以此為特色成為律所對外宣傳的吸睛點，因此律師事務所的人才培養模式中應當著重建設涉外法律人才。

(三) 搭建交流平臺，增強涉外法律服務國際競爭力

涉外法律服務涉及到國內法、國際法之間的複雜關係，其中包括援引與適用，因此對涉外法律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設立專門經費，提供一些機會供工作人員組團訪問以及考察相關國家的法律制度，參與一些國際法學會議等學術性活動開闊眼界。²⁷除了成立涉外法律公共服務中心以外，還應當建立起與公安派出所聯動起來的涉外法律服務點，形成一個區域聯動，服務點之間隨時溝通以解決問題。還可以創設國際電視頻道或者網絡通道，推出政策查詢、涉外法律糾紛案例講解以及涉外法律服務律師坐班服務。支持和引導我國部分涉外法律服務知名的律師事務所和我國涉外相應國家機關進行交流合作，共同探討如何更好地提高涉外法律服務的水平，推動我國涉外法律服務走向國際，提高我國在處理涉外法律服務糾紛中的話語權。

(四) 健全涉外法律服務形式，提高涉外法律服務質量

司法部高度重視涉外法律服務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自 2019 年 7 月開始，司法部指導全國律協先後在河北、山東、安徽等地組織舉辦了 11 場“涉外法律服務大講堂”，目的就在於健全涉外法律服務的方式創新，用思想應引導行動。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這就要求法律服務從業人員要保持旺盛的學習能力和強大的應變能力，在涉外法律服務上要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構建常態化法律服務關係網，搭建好對外交流平臺，使涉外法律服務更加靈活高效。廣東省為提高涉外法律服務的質量，在依托當地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優勢的條件下，與企業合作開發了“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網和粵港澳律師人才網，積極打造涉外法律服務一站式平臺。這些涉外法律服務的發展經驗都能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廣泛吸收和採納，提高其涉外法律服務水平。

綜上所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涉外法律服務的建設必將是銜接大陸與澳門之間法律糾紛解決的有效機制，也必將服務於《橫琴方案》中推動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需求，也更有利將我國的涉外法律服務水平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27 張晨：《努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務能力和水平》，《法制日報》2021 年 10 月 25 日，第 001 版。

參考文獻

黃雲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深度解讀》，《廣東教育高中版》2021年第11期，第54-58頁。Huan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Overall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engqin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GuangDong Education High School Edition,no,11,2021,pp.54-58.

歐陽琦：《澳門金融法律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Ou,Y. “Macao’ s Financial Legal System,”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2016.

文雅靖：《如何協調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制度體係》，《開放導報》2019年4月8日第2期，第56-60頁。Wen,Y., “How To Coordinat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hina Opening Journal,no,2,2019,pp.56-60.

丁浩、莊玲玲：《澳門金融業融入大灣區發展的機遇與路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報告（2018—201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Ding,H.&Zhuang L., “Opportunities And Paths For Macao’ s Financial Sector To Inter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Report On Guangdong-Hong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2018-2019,GuangZhou: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8.

黃惠康：《從戰略高度推進高素質涉外法律人才隊伍建設》，《國際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18頁。Huang,H.,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ingent Of High-Quality Foreign-Related Legal Personnel From a Strategic Height,” Chine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no,3,2020,pp.10-18.

袁宗勇：《關於發展壯大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探索與思考》，《中國司法》2017年第8期，第53-56頁。Yuan,Z.,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Service Industry,” China’ s Judicial,no,8,2017,pp.53-56.

陈广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Chen,G.,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Report,”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8.